

“语文独立设科 120 周年”笔谈

编者按：2024年12月7日至8日，“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语文独立设科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来自语言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33位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本刊选取其中14位专家的学术观点，以笔谈形式予以刊发，纪念语文独立设科120周年。希望语文教育能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融入教育现代化，促进人的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走有中国特色的语文 教育现代化之路

刘国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

我20多岁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在那里度过了大半个人生，主要从事语文教材编写、审定和研究工作。回想当年，叶圣陶先生带领我们编语文教材，我跟叶老学到了很多，第一便是语言的锤炼、运用。他主张写出来的文章，一定要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用真正的白话、真正的口语来写。说起来是“语”，写起来是“文”，“语文”两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在叶老平实而又深刻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明确，语文教育最基本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语文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历经120年求索，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以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语文教育，必须守正创新，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我们要尊重传统，科学地进行分析研究，吸取其中一切积极因素，作为发展当今语文教育的源泉与养分。对于语文教育，我们必须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这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是

中国人作为母语学习的语文教育，这种语文教育与其他国家的母语教育相比，有同一性也有特殊性。就后者而言，中国语文与其他国家的语文有很大差异，中国的语文教育传统以及文化背景与其他国家也有很大不同。因此，改革的立足点必须是自己的土壤，要着重从自己的土壤里汲取营养。对于外来的东西，也不是拒绝而是消化融合，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

第一，本国优秀的语文教育理论和经验，凝聚着语文教育大家在教育实践和语言实践中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以叶圣陶先生为例，他自身不仅有极其丰富的语文教育经验，而且在文学和语言方面都有着极其光辉的成就。他造诣精深，学通中外，他的语文教育思想最富有中国特色，也最具有时代性。说其成就翘然秀出于世界语文教育之林，是绝不过分的。

第二，本国优秀的教育理论和经验，融会了传统语文教育的精华。语文教育界“三老”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对传统语文教育都是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比如，他们批判旧式学塾那种逐字逐句的教学方法，却十分强调通过诵读来体会范文的意味、情趣和文气；他们反对旧式文人热衷于古代圣人之言的八股滥调，却十分讲究文章的谋篇布局，要求写文章做到自然圆和、严谨得体；他们鄙弃旧式教育把语言表现力说得玄妙

神秘，不可捉摸，却严格要求教师对青少年学生进行语感的训练；如此等等。这种对传统教育既批判又继承的精神，堪为教育研究的可贵示范。

第三，本国优秀的语文教育理论和经验，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些语文教育大家的论著，都善于从国外一些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那里汲取科学的理论观点，用以丰富、完善我们的语文教育体系。从建构语文语法教学到提出学生的主体作用，从强调思维品质训练到发展学生智力等，都是很好的说明。但是，学习、借鉴国外的东西，不能生搬硬套，而是要根据中国语文的特点和中国青少年的心理特征，灵活地加以运用。这种立足于我国民族传统教育的创造精神，值得大力发扬。

第四，本国优秀的语文教育理论和经验，没有深奥难解的炎炎大论，平易近人，如话家常，谈的都是近在身旁的事，说的都是大家爱听的话。因此，学起来便捷亲切，实行起来易见成效。当然，学习要采取科学态度，从实际出发。

今年是语文独立设科的双甲子之年，回眸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展现语文教育探索的有益成果，这既是对当下语文教育发生发展的深刻追忆，也是对语文教育先贤们的深切致敬，更是对中国语文教育的深远昭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语文教育应适应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有效地为青少年传递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文化传统。《庄子·逍遥游》中有言：“日日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燭火微光，贵在精诚；朝暮相从，亦可燎原。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将成为语文教育现代化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而坚实的探索。

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 促进人的现代化

于漪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就“继往开来、守正创新，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开展高水平学术研讨，很有价值和意义。研讨多维度多层次，贯通古今中外，放飞思

想，逻辑论证，事实支撑，不仅展现世界历史风云激荡，现实斑斓多彩，更是畅想未来图景无限美好，必然真知灼见、异彩纷呈！希望本次研讨在语文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内容、途径、策略等诸多方面能取得更多共识，助力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高质量建设。

一谈到守正创新，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我这名长期在第一线耕耘的草根教师就充满了美丽的憧憬。语文教育现代化最具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的语文教育现代化，它散发着时代的创新活力，把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通过中国特有的语言文字载体，播撒到学生心中，滋养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收获精神的成长，获得良好的语文素养。

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现代化，胸怀宽广、辨识精准，能借鉴世界各国语文教育的有益经验，在“化”字上下功夫，丰富充实自己。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现代化，说中国语文教育自己的话，坚定地走中国语文教育自己的路，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为强教、强国作贡献。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语文就是人生，伴随人的一辈子。语文不仅和人的语文能力密切相关，而且和人的教养、品质、思维、气度、胸怀、追求等密不可分。为此，我期盼语文教育现代化能够惠及所有学生，为他们的人生打下必备的、朴实的、扎实的基础。

基础教育要教好每一个学生，引领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全面发展。基础教育的学生群体在地域、经济、文化背景、家庭情况、周边环境、个人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语文教育现代化要面向全体学生，从学生真实的、复杂的实际情况出发，方能真正彰显教育的公平、公正和人民属性，为全民素质的提高打下扎实的、良好的基础。

语文独立设科是走向 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1904年“癸卯学制”设语文为中国文字科，

至今已 120 周年，从此学校有了语文教育。语文独立设科对中国教育的普及化、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语文是交流的工具。语文独立设科前，学堂只有读经，是为了科举考试，没有把语文作为交流的工具。语文独立设科后，与读经的性质完全不同，语文成为交流的工具，同时语言文字也就容易学习了。到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更是语文教育走向普及化的重要途径。

120 年来，中国语文学科经过多次变迁，但是语文的根基没有变，汉字的意、形、声结合的基本结构没有变，语文作为交流工具、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职能没有变，以文带教的教学方式没有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苏联，把语文学科分成汉语和文学两门，这并不符合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后来就改过来，把汉语和文学合起来，将优秀的文学作品编成教材进行语文教学，这就是中国语文学科的特点。

120 年来，语文教育也经过多次争论，有工具性与文化性之争，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之争，以阅读为中心与以作文为中心之争，先学拼音与先学识字之争，等等。经过争论，近些年我们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语文既是交流的工具，又是文化的载体。语文教育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语文的知识，更要发展学生的思维，还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语文教育要把这些作为根本任务。

在语文教育上，我是“外行”，再说两点“外行”话。

第一，语文教育要加强阅读。语文学习仅依靠课本内几篇课文是远远不够的，要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阅读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去体验、体会。过去的语文课，语文教师讲课文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把课文讲“死”了，讲碎片化了，所以学生有时候不爱听。应当让学生加强阅读，自己去体会，每个学生都有各自不同的体会，大家再通过交流，获得共识。

第二，语文教学需将课文的时代背景讲清楚。有一次我去听课，一位教师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说孩子们在百草园玩得很高兴，但是到了三味书屋之后还是要好好学习的，

这就是完全没有理解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本意了。不久前，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科举考试还是培养了不少人才，并不是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这也是没有理解鲁迅写作的用意。科举制确实比世袭制进了一大步，选拔了不少人才，但埋没了更多人才，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更是如此。所以，教师讲课要把课文的时代背景、具体场景讲清楚，让学生去体会、理解。

语文教育关乎一个人的人生，语文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培养有家国情怀、政治素养的时代新人。

语文课程的继承和发展

王 宁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我在语文教育上是一个志愿者，我没有教过语文课，不是非常懂得教学，只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传统语言学的知识拿给教师们看看有没有用。我谈“语文课程的继承和发展”，只是想说一说自己这几年跟教师们接触的领悟和感想。

中国自从有教育——不管是宫廷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就有语文。语文存在有多长时间？我大概算了一下，从西周公元前 1046 年开始，到今天有 3000 多年。这么长的时间，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课里，最重要的、打基础的课是书和数，书是语文，数是数学。其实，古代的数学书《九章算术》《周髀算经》，都是用文字写的，其中并没有算式，现代来自西方的“数学”才真正与语文分开。礼和乐是用“书”写的，你要读它，也是语文。射、御是要练的，但是它的规则和规矩，也是写在书上的。所以，语文的第一个要义就是读书，也就是阅读。到今天，这一点没有什么变化，学语文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读书，从读的书里学会自己写文章。

当下的语文课程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中小学的很多学生不喜欢语文。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我念书的时候，所有的学生不管功课好的、功课不好的，都没有反感语文的。我跟很多

家长聊天，他们说语文重要，因为语文考试是150分，看来，语文的重要是提高分值带来的，并不是人们觉得语文是对人生不可缺少的，是有用又很贴近生活的。如何改变这样的现象呢？

第一，要重拾语文的威望。在我国古代，不管哪一个时期，语文课程的成果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包括他的交流能力、书写能力、辩论能力等，这些能力和人做事的风格，都是衡量一个人是什么水平的标准。现在还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现在衡量一个人，常常是看他有没有钱，看他的官位有多高。重拾语文的威望，就是要对人的素质的评价作为每个人心里评价人的重要标准，语文素养高低，是人素养高低的重要侧面。翻开《二十四史》以及古代的其他著作，我们会看到有很多人是因为字写得不好、跟别人交流不得体、讲典故成成语、在称谓别人的时候混乱，而遭到众多非议，甚至丢了官、失了友，被人奚落和嫌弃，这样的事历朝历代都有。当语文素养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评价，受到大家的重视，我们或许能够拾回语文教学和读书的威望，人们也会因此而更加重视读书。

第二，要在更深的现代化基础上，去重新建立语文科目所能传达的一些文化认同，也就是真正理解和认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前些年我常常去听课，跟教师和学生们的交谈，也会遇到让我失望的问题。有一位教师讲成语，让学生去搜集成语，然后分析成语。我心里就想，如果我是学生，就一定会提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成语都是四个字的？结果没有人提，教师也没讲，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可讲的。实际上，成语是四个字，四字格是汉语单音节、有韵律的特点带来的，这是汉语很明显的特点，大有讲头，但居然语文课上被这样忽视。下课后，我问学生：“你们讲成语，知不知道很多数字是可以做成语的？”回答：“我们注意了。”问：“为什么三和四搭配到一块儿都是贬义的？比如，不三不四、颠三倒四、朝三暮四、推三阻四……全是贬义。”“为什么七和八配起来都是不好的？七零八落、七拼八凑、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等。”学生摸摸头：“还真是，没想过。”问：“自然数的个位是正整数，是数学的‘小儿科’，这个问题数学讲吗？”学生说：“数学怎么会讲这个？”在我们的

语言里，属于科学的部分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属于文化的部分，各民族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语言的民族性。语文教师应该借着这个问题带领学生明白这就是民族文化问题。中国话里面特有的东西，语文课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只讲语言的普遍性，不讲语言的民族性，在语文课里，会丢掉很多有趣又有用的问题。不要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古诗词。

第三，要重视语文课程的理性。语文课常常出现的问题，是教师不会就着课文提问题，不知道怎样才能将学生从语义理解上导入到思辨性思考上。想一想，我们现在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从国外来的，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语言规律并没有很好地被总结出来，没有使语文课有一定的语言理性。我时常觉得我们做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研究的人，从某种程度上，亏欠了语文课程，以至于至今语文没有系统的知识体系。我曾听一位教师讲词组，他举了不少“偏正式（定中式）结构”的例子，我问他“麦苗”和“火苗”是同样的结构吗？他说“是”。我说，“麦苗”讲的是“苗”的类别，“火苗”讲的是“火”的状态，它们一样吗？我又问他“渔网”和“法网”一样吗？他说“一样”。我说“渔网”讲的是“网”的捕鱼功能，而“法网”讲的是“法”的严谨状态，这两个词怎么能一样呢？其实，他讲的就是西方句法的结构，只求形式，不讲意义。一加上意义，就讲不通了。

语文的理性，是通过汉语的语言事实总结出来的。我们现在经常讨论语法是否有用。当然有用，但是光有语法不行。从西方舶来的语法也是有用的，但能不能全然对应上汉语，需要斟酌。举个例子，《论语》中的“绘事后素”，这个“后素”中的“素”就是底子，白色的底子。古代有两种讲法，一种解释说先涂颜色，然后再打底，花纹就显示出来了。另一种解释说先有白色的底子，再在白色的底子上面画画。这两种解释都是针对“礼后乎”说素质和修养的关系。第一种解释是“底子在花纹的后面”，第二种解释是“花纹在底子的后面”。那么，“绘事后素”为什么会出现两种讲法，意思又一样呢？这就是语法的问题。听了那么多《论语》课，没有哪位教师用它讲语法。其实，古代汉语课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题，我自己就主编过两种《古代汉语》，但没注意过中学语文出现了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讲过。之前与当下的语文课都存在相当的随意性，缺乏科学性。音乐有声学作基础，音阶可以讲解；绘画有光学作基础，透视和色彩可以讲解；艺术背后是有科学的。那么，语文背后的科学是什么？应该是语言学。从师范教育来讲，语言学本来是语文课的后盾，但是做语言学研究的我们并没有当好这个后盾。当然，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很强的课程，并不都是理性，不能把语文课教成数学课那么精确。但语文课程如果一点儿理性都没有，全凭个人感悟，想让学生去“思辨”，还要让学生喜欢，难上加难。

汉语是一种重意义的语言，我们对于它的科学性研究还不足。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一定要在科学性、专业性上为语文教学服务，让这么重要的一门课真正地放出光彩来。

“国语”“国文”改为“语文” 的由来及启示

郭 戈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

新发现的历史文献《中小学教科书审读意见书》（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1949年7月）和《中小学教科书审读补充意见书》（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1950年2月），是新中国教科书的“出生证”，也是研究开国教科书的第一手关键资料。其中，列举的1949年秋季学期和1950年春季学期可供全国选用的小学“国语”教科书有6种（华北版、华东版、东北版、西北版、河南版、开明版），初中“国文”教科书有6种（华北版、华东版、东北版、河南版、开明版、文化供应社版），高中“国文”教科书有2种（华北版、河南版）。在1950年7月，由教育部、出版总署首次共同发布的关于全国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中，才第一次出现“语文课本”的字样。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出版总署编审局宋云彬、朱文叔等编写，《高级中学语文课本》（6册）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魏建功、

周祖谟等编写。两套书均由新华书店1950年8月初版，从1951年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被确定为全国初、高中语文科的唯一通用教材。其第一册的“编辑大意”中开明宗义地宣称：“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1950年8月，教育部同时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1950年7月《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初稿》中还称“小学国语”）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也分别提出了“小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课程方案。与此相一致，无论是新编的还是当时正在使用的一些“国文”“国语”教科书，大都取名或改名为“语文课本”。其中，较早的有毛效同等编写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4册，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2月初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修订版）与王泗原等编写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2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11月初版）。1952年则出版了刘御等编写的《小学课本语文》（3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5月初版）与鲍永瑞等编写的《农民语文课本》（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7月初版）。其中，《小学课本语文》是最早的带有“语文”字样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是为新实施的小学五年一贯制而新编的，因此还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语文教材大谈论，即所谓“刘吴（即刘御与吴研因）之争”。自此以后，中小学语文课程和教材的名称就统一了起来，并由课程教材带动学校教学，由教育界影响全社会，“语文”一词很快通行全国，家喻户晓。

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在《答滕万林》的信中回忆过“语文”一词的由来：“‘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由此可见，“国语”“国文”改为“语文”，中小学课本及课程标准首开先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由叶圣陶等开

始酝酿、提出，1950年7月由官方机构正式发文作出了决断。

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叶至善说过：“以‘语文’取代先前的‘国语’‘国文’，应该说是一次划时代的实质性的改革，绝不能看作仅仅是名称的变动或统一。”我们认为，这是新兴中国百废待举、万象更新、重建学科的一个范例，也承载了20世纪上半叶“语文人”对于“语言”与“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相融合，以及中小学语文一体化教育的探索和积累。其影响深远，不仅波及课程、教材、教学，而且深深地影响到说母语、学汉字、讲中国话的每一个人，“语文”变成了学校教育以至社会生活的一个正式称呼和日常用语。与此同时，“国语”“国文”的概念在国人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不是业界的人很少会提及它们。由此也表明，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编纂非同寻常，对于术语的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语文”一词也有百年历史，最早是“语言文字”的缩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国语文运动”即为此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语文改革”也是如此。若说课程教材改称“语文”完全无其影响，显然不是实事求是。但此“语文”非彼“语文”之意，正如叶圣陶所言，实为“国语”与“国文”的统一、“口头语”与“书面文”的合并，“听”“说”“读”“写”的并重。

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 语文教育观问题讨论

孙银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语文教育观是语文现代化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研究探讨这一问题意义重大，不仅关系到对语文内涵的理解，也会影响到语文知识体系的建构、语文教材的编写，甚至能够推进语文课程改革走向深入。从更高层次上看，语文教育观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符合国家战略需求为目标导向，以立足语文教育传统、守正创新、立德树人

为最终目标，其理论指导意义不言而喻。

回顾过去的120年，从20世纪初的国文教学，到1920年以后的国语教学，再到1951年出现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的历程跨越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应地，其内涵也都在更新变化。

从1902年吴汝纶提出国文教学的倡议，到1920年全国中小学真正实行国语教学，这中间经历了18年。这个历史性的变革来之不易，是全国上下推广国语运动的最终成果。此前，中小学一直是国文教学，以学习文言、学习古代文学作品、鉴赏古文为主要内容，目的是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以引起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同时还练习用文言作文。

国语教学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语文”的名称开始出现。新中国成立之初，叶圣陶草拟了一份《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1950年教育部颁布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把“国语”改为“语文”，“语文”的科目名称被官方确认。

其后，中学语文还经历了汉语与文学分科实验，最终又回归到“语文”教育。1952年9月，教育部拟定语文科的教学大纲，参照苏联教学模式，中学学习“语法”和“文学”，叶圣陶听从胡乔木的意见，将《语法》增加了语音、正字、词汇、造词、篇章结构以及语言学的初步常识，把《语法》改名为《汉语》。由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出了《汉语》和《文学》课本，初中、高中各6册，后由于多种原因，汉语、文学分科实验中止。1958年3月，国务院做出决定，仍然把“汉语”和“文学”合在一起，称作“语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语文教学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语文教学模式，一种是阅读、写作分立模式。相应地，教材也有两种体系：一种是《语文》教材体系，一种是《阅读》《写作》教材体系。可见，“语文”科目从开始产生到稳固确立，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从国语国文合并，到汉语文学分立，再到汉语写作阅读分立，最后又再次回到“语文”。

120年的语文教育发展史，每一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语文观，并由此产生特定的语文教学模式，二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语文教育观影响语文教学。总结起来，“语文”主要有两

百廿年语文课程的探索

刘正伟

(浙江大学教授)

种意思：一是语言文字，二是语言文学。这两种意思虽然最常用，然而都不是当初叶圣陶设立“语文”科目的原意。叶圣陶最初提议用“语文”这个名称是要强调，口语为“语”，书面语或者文章为“文”，学“语文”就是既要学口头语言，也要学书面文章，最早的“语文”原本就是国语与国文合并而来。

20世纪50年代的《汉语》《文学》教材就分别体现了“语文”的两种常用意义——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这两种意义分别把“文”解释为“文字”“文学”。王力则明确表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现行的语文教材，除选入文学作品外，还编入了各类应用文性质的书面语，可这些并不属于文学作品。这样看来，语文的确切含义应该比语言文学的范围更广。相对而言，文字不仅指书写符号，还可以表示各种形式的文章，如果把这些书面形式的文章作品都归到文字的范畴，就很切合语文的实际。

后续的多次语文课程改革中，把“语文”解释成语言文章或者语言文化的，也大有人在，甚至还有“大语文”的说法。语文观不同，语文教学理念不同，语文教学的内容也就不同。语文知识包罗万象，真正应该教的知识有哪些？为什么吕叔湘会有“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的感慨？语文教学“少、慢、差、费”，这肯定也是过去100多年语文教育不断改革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语文教学的内容既多又杂，语文学科的内涵与边界模糊不清，不同时期，人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对象、教学目的的认识也都各不相同。国语教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差别明显，很容易看清。语文科目产生以来，认清语文学科的性质、确定语文教学边界、理解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理应是解决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问题的关键。当初设立语文这个科目，是为了训练学生的语言和文字应用能力。120年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语文教育始终围绕语言文字学习与运用这一核心目标发展着，这既是语文独立设科之初心，也是语文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可以说，树立正确的语文教育观，是推动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关键。

自1904年独立设科，语文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课程，从此开启了探索与建构的征程。从“中国文字”“中国文学”“国文”“国语”到“语文”，120年来语文课程名称的演变，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国家对人才培养规格及素质要求的变化，也表征着我国语文课程自主探索与建构的历史进程。从清末批判臣民、倡导培养国民，到现代造就公民，这些教育目标的变化直接影响语文课程目标的设立、内容体系的建构、知识结构以及课程编制方式的选择。

语文课程体系的建立与探索，首先涉及知识内容的选择、安排与建构。作为中小学国家核心课程之一，语文课程的建构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土壤中，是对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语文成就及传统的承载与汲取，“在遗产里予取予求”。它要“抓住一个已定的起点去前进”。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民主、科学精神的洗礼下，语文课程根据培养现代公民的目标和要求，吐故纳新，建构了文言、白话兼顾的语文课程内容体系，古老的语文教育被赋予新的生命，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语文课程内容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并非自我封闭、抱残守缺，而是放眼世界，在积极借鉴与汲取世界先进国家教育理论、民族语文经验与学习方式的基础上，实现自身身份的建构及转换。正如朱光潜所说：“一个民族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吸收滋养料，可以使自己的文化更加丰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语文本身经历了一个积极向西方语文学习的过程，即语文的“欧化”阶段。正是通过“欧化”，语文的语体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嬗变，白话文成为语文的主要表达工具。同时，语文课程积极引入当时世界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作为重要的课程内容，一大批表现民主、科学、公民道德及爱国主义思想与题材的作品进入语文教材，扩充了语文课程的知识内容，在世界文学的谱系中重新定位语文知识，建构了以白话文、文言文和外国文为主的内容体系，并通过

外国语文的学习，培养学生认识与理解世界的语言文明素养。

语文课程的探索与建构还表现在积极依据现代教育理论，建立科学的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与话语。语文课程知识体系的建构包括语言知识与文学知识。清末《马氏文通》进入新式学校，成为教授国文的重要教材。20世纪20年代，黎锦熙借鉴教育心理学、现代语言学及杜威教育哲学等理论，根据汉语规律，将国语课程划分为听、说、读、写四个部分，还借鉴杜威的观点，提出通过符号学习进入学问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出国语教学的三段六步法；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撰写《修辞学发凡》出版，为修辞学的建立奠定基础。现代语言学为语文立法，其开创性的研究，使之以合法、科学的形态形塑了语文，并构成了语文学科知识的重要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及博比特课程理论的影响下，胡适继国语革命之后，提出了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即“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都能明白晓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舒新城依据语言素养与文学素养的不同，提出了语言教学与文学教学的不同策略；廖世承借鉴博比特的课程理论，阐述了“文学和读法课程的教材”编制原理，并提出了文学课程、教材及教学的相关标准；夏丏尊借鉴日本文章学理论，建构了以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四大文体为基础的普通文章分类体系，探讨文艺文与应用文的性质和归属，并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正式写进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语文学家对国语文学的属性、功能、文体构造及实践进行探讨，建构了文学知识的结构及话语。语法、修辞、逻辑、文学史，听、说、读、写，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些概念作为学科知识的基本要素和话语，构成了20世纪现代语文课程知识体系与结构的基础。

语文课程的探索与建构还体现在语文学习方式的变革上。杜威曾把课程探究与学习方式称为学科课程的科学或合理化的知识。他一再提醒人们，组织、结构、系统固然为课程的科学知识之表征，而探究与实验的方法，才是科学与不科学的真正分野。简言之，课程除了受学科逻辑支配外，还蕴含着学科探究方式、方法。杜威强调，

它是内在的；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语文课程变革的关键，是更为深层次的东西，自主性是其实质。清末从传统读书法到引入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再到20世纪20年代倡导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等等，都体现了语文课程改革中自主性的学习方式变革。这不仅是20世纪中国语文课程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世界先进国家对人才培养规格及国民素养提升的共同诉求。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启动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一轮语文课程改革，课程编制与学习方式变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大概念、大单元、大任务等新的学习方式，正是我国语文课程处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借鉴国际学习科学理论、面向未来培养创新人才的积极探索。如果说语文课程内容知识构成了语文课程的本体，那么，课程探究及学习方法则代表认识和理解世界的一种学科方式。它既是看待世界的视角，也是生存于当今世界、确证人之存在的手段与途径。这是时代之需要，语文课程改革的意义即在于此。

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化审视

黄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语文教育民族化，即在语文教育进程中，深度彰显本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等多元要素特质，以民族语文为内核，将民族文化蕴含的精神、价值观、思维方式融入教育实践全过程，构筑兼具理念与实践双重维度的教育范式和路径。语文教育民族化问题在时代巨变和“西学东渐”中逐步形成并愈发凸显；在与西方教育制度及文化的冲突、碰撞、交融以及吸收转化历程中，孕育出现代语文教育民族化的崭新特质。语文教育民族化的内涵、特征也因社会、时代的变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更新和重塑。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交织，旧有教育体系无力满足时代对人才培育的需求，西方教育理念与制度乘虚而入，打破传统语文教育固有格局，民族化问题应运而生。彼时，人们一方面洞察西方

教育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忧心民族文化在现代教育中的孱弱,进而思索语文教育民族化的前行方向与实践路径,力求在稳固民族文化根基的同时,汲取西方教育之长,改进传统语文教育。

早期语文教育民族化实行的是“中体西用”策略,引入西方教育制度与课程设计,诸如创设新式学堂、推行班级授课制等现代教育组织形式,建构具备现代学科分类特征的课程体系。然而,其教育目标与课程内容,仍以本国文化传统与需求为内核,仍用西方教育文化的“壶”装中国传统文化的“酒”。

20 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白”之争,是民族传承创新的深度探寻。“文白”之争绝非单纯语言形式的角逐,它展现的是民族文化的容量和张力,是语文教育民族化的新亮点,赋予了语文教育民族化新内涵。此后,语文教育民族化进入“化西为中”阶段,不再单纯套用西方教育模式,而是深度理解、消化和转化西方教育理念与方法,使其融入民族语文教育的内在体系。由此,无论是语文课程设计抑或是教材编写,都逐步形成了本国语文教育的鲜明特色。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语文教育领域竞相开展各类教育实验与实践探索,彰显着语文教育民族化迈上了科学理性之路。晏阳初发起平民教育运动,聚焦平民语文教育普及,将民族文化推向社会底层;俞子夷开展了设计教学法的“中国实践”;艾伟运用科学实证方法探究学生阅读、写作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等等。这些教育实验皆非盲目因循传统或简单模仿西方,而是基于实验实证的研判,为本民族语文教育改革融注了科学精神,促使语文教育民族化的步履更加稳健,也更有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民族化进程在广度和深度上同步发展。语文教育民族化更具人民性、大众性和普惠性。扫盲、推广普通话、简化并规范汉字等多举并进,大大增强了民族语言的凝聚力、传承力,有力推动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广泛性和普及性。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语文教育民族化的进程又迈上新台阶:在语文教育目标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文化自信作为重要目标之一;在课程教学内容上,大力加强并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在教学方法上,加强启发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等等。凡此种种,体现了语文教育民族化的立体纵横展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

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语文教育民族化进程,是语文教育民族化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弘扬的历程,是一条对优秀语文教育经验的凝练、发展、改造与创新的道路。这 120 年的进程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当今语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带来深刻的启示并提出必须应答的课题。

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始终是语文教育的首要重任。从古老的诗词歌赋到经典的散文小说,从蕴含深邃智慧的诸子百家到承载历史风貌的史传文学,诸多文化瑰宝为语文教育积淀了深厚的底蕴。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于语文教育之中,有助于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将为学生成长筑牢精神根基,使他们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时,自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和践行者。

在近现代语文教育民族化的曲折进程中,争鸣之风与实证精神交相辉映,成为推动语文教育民族化自我更新、砥砺前行的关键力量。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的“文白”之争、目的之争、方法之争,推动了对本民族语文教育的深度理解与研探。特别是语文教育实验,以科学理性精神来考量传统教学方法和西方引进教学方法的实效性和适用性,这些语文教育民族化进程中的探索构成了“新传统”,对于较为缺失“争鸣之风”和“实证精神”的当下尤有警示和借鉴价值。

语文教育历经数千年发展,积攒了丰富且珍贵的教育教学经验。对于这些教育教学经验,我们需要发掘与发扬、优化与转化,而不是随意摒弃,转而盲目追捧西方的舶来品。当前语文教育领域中,西方教学概念叠床架屋、乱花迷眼,与之相对,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和教学经验却受到冷落,少有研讨。事实上,其他学科借鉴他国教学方法多有必要,而语文教学方法虽然也应学习借鉴,但大多要从自己的教育传统中生长,从经验中提炼,因为汉语的民族性、独特性决定着教学方法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它绝不能是对西方母

语教育照搬照抄和简单模仿。

语文教育民族化之路不是单轨独行，而是与语文教育现代化、科学化相伴而生、携手共进。如何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化解矛盾、消弭间隔，做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创建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本土特色之路，仍是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大课题。

百廿年语文考试演变发展的启示

胡向东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语文设科以来的 120 年，语文考试与语文学科相伴而生，与语文教育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其曲折发展道路，留给我们诸多深刻启示。1904 年“癸卯学制”颁行后随即出台的《奏定各学堂考试章程》，标志着现代中国学校考试制度的建立，而学校语文考试也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发展：发轫于科举，奠基於传统语文，在从传统走向现代中新创，在迎接和拥抱西方先进测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进行深度融合，并在融合中不断创新，直至形成特色独具的现代中国语文考试制度和体系。

创立系统的语文考试制度体系。独立设科后语文教育的发展，为语文考试脱离选官考试、独立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其间既经历了 20 世纪初考试权下移、各级学校自主进行入学考试和学业考试，也有 1932 年国民政府上收考试权，设立中学毕业会考、大学招生统考和联考等制度，形成基于统考传统的国家和区域考试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建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和地方学业考试制度。与数学、英语等学科考试不同的是，语文考试身上传统的包袱更为沉重，其制度创新的压力与阻碍也更为明显。

创立现代语文考试的内容体系。现代学制的建立、语文课程标准的逐步完善，促成了语文考试观念的转变和考试目标的革新。在考试内容上，从经义文言到现代语文，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与适应时代社会转变的崭新的现代语言文化知识错综交织，语文知识的重构促成了语文考试内

容的变革。民国语文会考强调考查教材内容等，用统考的形式，将语文考试内容、方式的演进成果进行固化，也开创了后续依据课程标准命题、关联语文教材内容的“新传统”。恢复高考后，语文考试以高考为统领，考试内容得到全面扩展，与时代、社会和学生生活结合更为紧密，形成了由基础知识、阅读、写作构成的基本架构；语文考试命题从知识立意走向能力立意，进而转向素养立意。

创立独特的中国语文考查方法。民国时期中西语文考试文化剧烈碰撞，既促进了传统语文考试向现代转型，更为新型语文考试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带领中国语文考试进入了现代化的建设期。其最为显在的成果，就是传统论文式考查与西方测验理论方法在抗衡中逐步走向融合，形成了以“新法考试”为代表的中西结合新型语文考试形态。而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语文考试标准化探索也取得显著成效，在结合汉语特征基础上，形成高考语文能力层级和基本试卷结构，题型设计不断创新，语文考试不再一味按照语文教材内容指向命题，而是加强教考衔接，进一步强化语文对于能力、素养的考查，进而反拨语文教学，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养成。

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语文考试已走过两个甲子，近 50 年的发展更是有目共睹。经济社会的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社会走向高度信息化和智能化，使语文生活和语文教育发生了深刻变化，给语文考试增加了新的内涵，语文考试迫切需要加快现代化进程，以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强国建设。在纪念语文独立设科的双甲子之年，重新审视语文考试的发展历程，可以从中获得有益于大力推进语文考试现代化进程的启示。

首先，要促进语文考试观念的与时俱进，使其适应语文教育发展需求、语言生活需求和人们高效使用语言文字的需求。当前最重要的理念转换，就是要将语文考试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传承、理解和发展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构建引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语文考试内容体系，形成和发展中国语文考试文化，发挥基于学科特性的语文考试独特功能，通过育才导向机制，服务于立德树人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

其次，语文考试要坚持科学化道路，尊重语文学科发展规律，建设科学化的语文考试内容和方法体系。语文考试具有语言文字发展的基础性、意识形态统摄性、对教学发展的引导性等特性，自身科学化是社会和人的发展对其提出的必然要求。在语文考试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要以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推进考试内容、形式和方法的革新。既要克服把考试仅仅作为标榜公平的手段，也要防止扩大、滥用统一考试的督导和统摄功能，确保考试科学地发挥作用，服务于语文教育教学，服务于社会 and 人的发展。

最后，语文考试要走民族化的发展道路。陈寅恪曾在 1936 年时提出，“本大学考试国文一科，原以测验考生国文文法及对中国文字特点之认识”。因此，“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含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至今仍对我们有着重要启示。

120 年语文课程标准的迭代发展，新时代基础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的颁行，不仅为我国建立和完善语文教育内容体系打下基础，也对我们守正创新、结合汉语特点建立自己的母语素养测评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核心素养导向的语文考试体系的今天，我们既要充分学习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语文测评理念和方法，从当今基础教育语文学科发展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更要充分尊重汉语历史和发展的特征，契合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选择与汉语特征相适宜的方式方法，建设民族化的现代语文考试体系。

独立设科以来的语文 教师问题讨论

苏尚锋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语文独立设科 120 年，不仅培育了无数英才，而且缔造了一支规模宏大的中小学语文教师队伍。语文学科的不断成熟、完善，不仅关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且与广大学生、语文教师的群体和个人成长直接相关。语文教师

是影响语文教育质量的关键动因与直接要素。语文教师几乎参与了语文教育的所有历史实践，他们是现代语文教育运动和制度演进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者，并以其个人或群体的专业素养和实践智慧推动着语文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可见，语文教师问题是现代语文教育各类问题中的主体问题、行动者问题，是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语文教师问题直接关系到语文教学质量，关系到语文教学的具体行为及改进，关系到师生关系的形成及学生的健康成长。现代语文教育的一切问题都最终归结并反映在语文教师问题上，只有做好语文教师的问题研究与解决，其他问题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

每位语文教师既与他同时代的同人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彼此联结成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各具时代和区域特质的语文教师群体；同时，他们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因其从事职业内容、形式的相对稳定性、同质性和连续性，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纵贯 120 年的规模庞大的职业群体类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语文教师这一群体进行了许多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与论述，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注领域与研究框架。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强调语文教师的职业特点与语文学科本质特征之间所具有的密切关系，甚至多数研究者是基于语文学科课程的特征，进而考察或构建语文教师的职业特点与专业要求。有些学者则是从语文教育教学的基本任务与活动出发，对语文教师的角色行为与职业素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也留下了大量翔实而生动的语文教师角色行为的实证数据。

1912 年，一篇署名为“蛰”的时评文章发表于《云南教育杂志》上，第一次把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结为语文教师的问题，尤其是语文教师思想观念的问题。而最早明确提出语文教师问题并展开系统论述的学者是许杰。许杰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在 1924 年、1925 年两度发表文章，呼吁“注意国文教师问题”，“为研究国文教学问题，不得不连带及于教师问题”。几乎所有语文教育研究学者都罕有例外地论及语文教师的问题。尤其是叶圣陶、夏丏尊、吕叔湘、张志公等语文教育大家，更是多次

专文论述语文教师问题，并提出许多深刻的思想主张。

在学校教育制度创立早期，不同的学者主要关注语文教师的培养问题和其现代教育观念的养成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期，语文教师思想改造尤其是政治立场与思想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问题。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语文教师问题则更多直接表述为语文教师队伍质量问题，其中包含了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问题、能力问题和素养问题，以及人的现代化问题。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研究者除了持续关注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外，还相对集中于对语文教师的课程理解与创新、身份建构与认同等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分类整理，研究大致上可以涵盖不同时期语文教师的队伍构成、语文教师的地位与工作量、语文教师的职位分化、语文教师的职业特质、语文教师的角色期待、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卓越语文教师研究等多方面内容。

许多研究发现，语文教师的人才需求大，人数也最多，构成也最为复杂，个体间专业水平的差异也最大。这些既与从业人员的数量、需求有关，更与语文学科的特征相关。有人指出，语文这一学科的特点就是“易学难工”，胜任的教师难得，好的语文教师尤其难得。语文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较高，承担的工作量较大。在早期，“国文教员为学校中第一重要人物”，“学校之盛几全恃乎国文教员一人”。语文教师在有些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职位分化与分流。比如，“五四”前后逐渐推出国语科，还引起大家对国语教师、国文教师两个职位的难易争论。由于语文学科的基础性、综合性、丰富性和审美性，语文教师的角色特质存在经师人师说、杂家说、剩余说、文艺说等不同的理论主张。

语文教师对于学生来讲更具有榜样性，因此在人格、语言、行为、观念等方面拥有特殊的角色期待。语文教师语言表达的最特殊价值，在于它本身就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直观、最生动的部分。语文教师最重要的备课行为经常被描述为“钻研语文教材”。钻研教材也是许多语文教师提出最多的问题、最渴望得到帮助的行为环节。语文教师的教育观念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甚至许多现代教育观、学生观、教学

观的讨论都是从语文教师的群体内部、从语文教师的视角发端，并逐渐为所有学科所注目。叶圣陶是最早系统论述语文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地位这一观念的重要学者。不同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对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能力、修养等方面所提出的认识、要求，以及如何培养、发展的论述，形象地呈现了语文教师专业化进程的整体样貌。卓越语文教师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语文教育学术领域。

百廿年语文教育科学化的探索

赵晓霞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语文独立设科 120 年来的科学化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语文教育观念、内容、方法的科学化探索方面，值得我们回顾与总结。

一是语文教育观念的科学化。“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这是张之洞等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对语文课程内涵与价值的界定。120 年过去了，这一界定仍然清晰明了、切中肯綮。清末“中国文学”科以“理明词达”为宗旨，“中国文字”科以“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为要义；民国“国文”科“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国语”科“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新中国“语文”课程确立了从“正确地用普通话和语体文表达思想感情”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的性质。

透过 120 年课程内涵的变迁，一方面，语文课程坚守“独当其任的任”（叶圣陶语），即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一价值立场，明确了语文课程的边界，赓续了“止贵明通”之宗旨。另一方面，分科教育也带来了语文的“文道”之争。从 1963 年教学大纲“工具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到 2001 年课程标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尽管强调“文道”统一，但“工具性”的比喻说法，难免产生“文道”分

离的错觉。2022 年课程标准提出立足“语言运用”，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符合“文道统一”的语文教育实际。学习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达到“止贵明通”，本身就已经走在了促进学生文化自信、思维发展、审美创造的道路上，走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道路上，成为语文课程科学化探索所应达成的共识。

二是语文教育内容的科学化。要变革传统语文教育，紧跟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语文知识与情境炼制是关键。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白话文进入语文课程，胡适提出人人能用国语作文、演说，都能明白晓畅；黎锦熙提出国语教育的读、听、说、作、写五大领域，并相应构建了读法、语法、作法、写法四大语文知识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育界提出加强“双基”的口号，并形成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八字“宪法”；改革开放后，针对“少、慢、差、费”现象，人们进一步探索教学内容的科学化。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列入语文知识和能力训练点，蒋仲仁提出“语言规律学习”与“范例学习”相结合，张志公提出语文知识教学须“精要、好懂、有用”等，皆尝试以语文知识撬动语文教育的科学化。

一方面，如何把握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不但文言和白话各有规律，而且“说的白话和写的白话绝不是一致的，它们该各有各的标准”（朱自清语），因此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文章学、逻辑学等知识，构建语文课程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如何借助语文知识促进学生发展？须借鉴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对语文知识进行课程转化。对此，夏丏尊、叶圣陶《国文百八课》作出了有益尝试。其特点首先是提炼了语文课程知识，并将其排列成有序关联的单元，又通过“习问”将语文知识与学习活动融为一体，由此构建了科学性、有序性、系统性的语文知识学习典范。2022 年课程标准提出“语文真实而富有意义的学习情境”，提倡知识学习的情境炼制，以构建“语文知识”与“认知规律”合二为一的科学化教育内容。

三是语文教育方法的科学化。提升语文教育质量，还须“按语文教学客观规律运用教学方法”（李秉德语）。对此，老一辈教育家们提出“言语训练”的语文教育方法。如叶圣陶提出语

文教学在于“进行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吕叔湘提出语文技能与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刘松涛认为语文教学“必须突出识字、写字、阅读、作文”的基本训练，章熊提出“语文教学科学化=名家名篇+科学训练方法”等。“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在 1978 年被列入语文教学大纲，“训练”一度成为人们关于语文教育方法的共识。

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训练”日渐式微，2011 年课程标准提出“实践性”并延伸出“言语实践”可为替代。夸美纽斯曾鞭辟入里地阐明了语文教育的科学方法，“一切语言通过实践去学习比通过规则去学来得容易”，“规则可以帮助并强化从实践得来的知识”，这里的“实践”即“听、读、重读、抄写”等“言语训练”。我们须进一步吸收老一辈教育家们的宝贵经验。

教育实验是促进 20 世纪语文教育科学化发展的重要方法。早在 20 世纪初，“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五段式教学法”等实验之风盛行。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艾伟关于国语、汉字教育的实验，他以 20 余年严谨探索树立了阅读心理研究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开展识字、阅读等教学实验；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如于漪、钱梦龙、洪宗礼、李吉林、宁鸿彬、魏书生、欧阳代娜、刘勰等一批实践家，探索科学教学范式；此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学习科学，脑科学实验等也纷纷引入语文教学，促进了语文教育的科学化。

总之，科学化是 120 年语文教育发展的显著标识。但科学化还需立足于民族化，我们在打开“科学实践”之门的同时，还须打开“至善实践”之门，进而迈向语文教育的现代化。

百廿年中学阅读教学目标的演进及其启示

罗文平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阅读教学目标的演进也反映了语文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

育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对这一变化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以1904年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为起点，以历次中学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为依据，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学阅读教学目标大体经历了以阅读知识的掌握、以阅读能力的训练、以阅读素养的培养为目标的三个阶段，这个阅读教学目标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人们对阅读教学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语文作为独立学科的不断成熟。

首先，以阅读知识掌握为目标。在早期的阅读教学中，知识是一个核心要素，阅读教学的目的主要是掌握知识，在生活和工作中发挥作用。同时，为了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阅读及其方法的知识也日益受到重视。《奏定中学堂章程》在“讲经读经”中就提到，“学生年岁已长，故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以备将来学成经世之用”。通过阅读教学，学生掌握了相关知识，才能在日后加以运用。1912年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指出“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进一步表明了阅读教学须在掌握语言文字知识的基础上，帮助学生理解内容、提升语言文字素养。

其次，以阅读能力训练为目标。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不仅要求“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而且要“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也提出“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能力”一词首度出现在课程标准的阅读教学目标中，预示着中学阅读教学目标逐渐由知识的掌握阶段向能力的训练迈进。1929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中指出的“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也是从阅读能力的角度表述阅读教学目标，其中还要求“养成阅读书报的习惯和欣赏文艺的兴趣”。这时的课程标准除了涉及阅读能力之外，还提到了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这无疑为阅读教学目标的探索增添了新质，也为孕育更高层次的阅读教学目标进行了量的积累和质的升华。1932年、1936年颁布的高级、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课程标准大体都沿用了

类似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我国是以“教学大纲”的形式规范阅读教学目标的。1956年颁布的《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都强调了训练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直至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都注重阅读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同时兼顾了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和阅读方法等，为深层次阅读教学目标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最后，以阅读素养培养为目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了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目标，与之相适应，阅读教学部分就要求学生“具有独立的阅读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的能力”。由此可见，阅读素养的雏形已然显现。阅读素养的提出是在阅读教学目标百年探索、百年积累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阅读素养是以阅读能力为核心，融合了阅读知识、阅读方法、情感体验、思维、审美等的综合体，是阅读教学的更高层次的目标表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及其2020年修订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课程目标都定位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在此引领下，阅读教学目标也被明确定格为阅读素养的培养。

中学阅读教学目标经历了120年的探索与演进，其间渗透着诸多学者及语文教师的心血，给今天的阅读教学提供了许多借鉴与启示。其一，阅读教学目标要走向科学化。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阅读方式也更加便捷，在此背景下，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掌握多元的阅读方式，灵活运用精读、略读、浏览等阅读方法，借助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引导学生多读多写，扩大阅读视野，促进阅读与写作的一体化。其二，建立科学的阅读分级目标。这样做，使阅读知识、阅读能力、阅读素养形成一体三面，帮助教师了解不同学段学生应具备的阅读能力和阅读素养，并进行个性化的阅读指导。推荐与学生阅读能力相匹配的阅读书目，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真正提升人文素养，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基。

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对学生 语文素养的要求

王德领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这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初就已明确。

在“癸卯学制”中,学生的语文素养主要来自四个层面:一是读经讲经,这是各级中小学堂必修的科目。因为经书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能够筑牢学生的国学根基。二是中小学堂所设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科目,是学生语文素养的主要来源。三是“修身”科目里包含的古代典籍,这是儒家诗教思想的延续。四是课外古诗歌的阅读。如要求“初等小学堂读古诗歌,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

“中国文学”科目强调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宜明白通达、清楚流畅,“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就阅读与写作而言,作文居于最核心的地位,习得文字、讲读文章的目的是为了作文。《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1908年吴曾祺编写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精选名家范本,让学生大量诵读,采取传统的评点法,就文章讲作法,重视作文,明显体现出学习国文主要是为了写作,为了适应生活所需。

1912年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里,不再要求读经讲经,《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提出“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智德”。此处,第一次提到了培养学生“发表思想之能力”“启发其智德”,开启了以能力为旨归的学生语文素养的先声。能力的养成仰赖方法,初、高等小学校对文字宜练习“读法、书法、作法”,中等学校国文课讲授“文字源流”与“文法要略”。这一时期流行的教科书,依然延续了“癸卯学制”重作文的倾向,如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采用传统的评点法,强调文章作法。

1923年颁布的各学段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就小学而言,教学目的是“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引起读书趣味,养成发表能力,并涵养性情,启发想象力及思想力”。教科书的编选体现了儿童本位思想,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影响至今。就中学而言,语文学习的目的是“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在阅读上开始分为精读与略读,并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开列了阅读书目。作文不再是书面的,还包括定期的文法讨论,定期的演说辩论,这提升了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这时的教科书废除了传统的评语圈点,基本训练由重写作转向重阅读。学生的语文素养开始具有知识化倾向,逐步加大了文学知识、国学常识的比重,写作能力逐渐弱化。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认识常用的字,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能够具有欣赏儿童文学的阅读能力。这时期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除了强调阅读和写作能力之外,还着重强调语文教育具有激发爱国意识、“唤起民族意识并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

1956—1958年实行文学、汉语分科教学,小学语文科除了阅读、写作、识字写字教学之外,增加了专门的汉语教学。中学的汉语教学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文学教学则基本上是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简明版。无疑,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语文素养,但知识量的大幅增加也超出了中小学生的实际能力。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提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这是对语文课程目的的概括,也是对语文素养的新认识。直到20世纪末,语文教学目的的表述基本稳定。

经过20世纪末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得以显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及其2020年修订版对语文核心素养进行描述,将

其分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其中虽然增加了新的因素，但万变不离其宗，语文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即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

回顾语文独立设科 120 年来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探索可以发现，无论时代怎样变化，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始终没变。而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关键之一是教师。因此要不断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学科能力，使之适应信息化时代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现在国家提出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人才现代化，这一切的关键是人的素质、人的现代化。因此，如何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已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必须思考的重要话题。

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

任 翔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1904 年语文独立设科，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与中国现代化潮流相伴而生的；语文独立设科 120 年，也标志着我国语文教育现代化走过了风雨兼程的 120 年。“现代化”不仅是指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也是指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是人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早在 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刊载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参与讨论的有 26 位著名学者，核心论题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和方式”，把“现代化”这个在当时非常新鲜陌生的社会科学术语进行了深入探讨，推动了“现代化”的普及与运用。对“现代化”的理解与运用，并不仅仅是对术语的简单创新，而是蕴含着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旧学与新学、保守与激进之间的强大张力。“现代化”代替“西化”，表现出的是知识分子对现代变革趋势的再认识，即“西方”并不等同于先进，“现代”才是进步的代名词。理解“现代化”，才能更好地理解语文教育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回顾历史，120 年的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取

得了显著成绩，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第一，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并借鉴西方先进经验，开启了我国语文教育的现代化。120 年来，从文言走向白话，从国文走向国语，再从国文、国语走向“语文”，每前进进一步都非同寻常。语文独立设科 120 年的历史证明，语文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基石。第二，产生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语文教育大家，如夏丏尊、黎锦熙、陈望道、胡适、叶圣陶、朱光潜、朱自清、王力、吕叔湘、张志公等。他们纵横古今、学贯中西，既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又深谙西方教育，他们的语文教育思想不但影响了当时的语文教育，推进了语文教育现代化进程，也对当下和未来的语文教育改革发展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三，进一步明确了语文教育的宗旨、目的和任务。1904 年颁布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总纲《学务纲要》，明确提出语文教育宗旨在于“止贵明通”和“清真雅正”，将语文教育聚焦于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运用，明确语文课程就是学习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一门功课，把本来用语言文字写出的东西，当作语言文字来研究、学习和运用，这是语文教育亘古不变的主旨。

审视当下，语文教育虽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在语文教育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而基础理论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根基，这些理论就存在于语文教育现实实践中和 120 年发展历程留下的丰厚资料里。因此，扎根中国大地，搜集、整理、研究语文教育理论资料，形成一体化的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格局，是推动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前提，也是编纂“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丛书（共 35 卷）的主要原由。只有丰沃的土壤，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展望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全国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是教育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也是我们语文教育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推动语文教育现代化，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现代化，适应国家现代化需要。国家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而语文教育是教育强国、文化

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基础。因此，要在继承传统优秀语文教育的基础上，遵循语文教育教学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研究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基本要素、主要问题和实践路径，研究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原则、主要维度、基本逻辑和研究范式。

回望 120 年语文教育发展的历程，面向 2035 年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愿景，我们要全面系统地思考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观念、思路、对策、方法等。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要放置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考虑，处理好几个关系。具体包括教育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科技现代化、人才现代化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强国、人的现代化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创新、人工智能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与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关系等。第二，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语文教育观念要现代化。具体包括语文教育中的知识、能力、素养之间的贯通问题，大中小学语文教育一体化问题，学校语文教育、家庭语文教育、社会语文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国民素质、语文素养与人的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科学化、民族化、现代化三者之间的融合问题等。第三，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语文教育制度要现代化。具体包括语文

课程制度现代化，语文教材制度现代化，语文教师制度现代化，语文教学制度现代化，语文考试评价制度现代化等。第四，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语文教育方法要现代化。具体包括信息技术与语文教育方法的现代化，人工智能与语文教育方法的现代化，听、说、读、写传统方式的现代化等。

语文教育现代化任重道远，艰巨复杂。面对时代洪流，语文教育管理者、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以及其他有关学科要共同努力，解答好语文教育的基本问题、主要问题、疑难问题和热点问题，使语文学科真正担负起育人的职责，使青少年成长为人格完整、心灵润泽、刚健质朴、美善相谐的时代新人。

回顾历史、审视当下、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有信心、有责任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深入推进语文教育现代化，更高质量地发展语文教育，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郭戈、孙银新、刘正伟、黄伟、胡向东、苏尚峰、赵晓霞、罗文平、王德领、任翔 10 位作者的文章为 202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2&ZD309）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曹 昞）